

全市贷款余额首破1.5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王齐维) 昨天,人民银行发布消息,面对经济新常态,全市金融机构一季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势头依然强劲:3月末,全市本外币贷款余额超过存款,首破1.5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小微企业和“三农”,同时企业贷款利率有所下降。

3月末全市本外币贷款余额15024.05亿元,比存款余额高出450.41亿元,比年初增加445.85亿元,余额同比增长8.21%。3月末,宁波市各项存款余额14573.63亿元,比年初增加244.31亿元,余额同比增长4.27%,增幅同比下降5.22个百分点。在资金进一步流向证券市场的情况下,存款增势比较严峻,从期限看,活期存款减少,存款定期化趋势增强。

“今年以来,全市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增量、盘活存量、拓宽渠道、引资金,为支持宁波经济转型创造了平稳的金融环境。”人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说,从贷款投向看,信贷资源配置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导向,主要向小微企业、“三农”、民生领域和重大项目倾斜。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保持稳定增长,重点投向重大项目建设。3月末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11763.87亿元,比年初增加418.51亿元,余额同比增长9.0%。个人消费贷款增速创下11个月新高,带动住户贷款稳步增长。其中个人消费贷款增加57.2亿元,余额同比增长9.31%,增速创下去年5月以来新高。个人消费贷款的增加得益于个人住房贷款和信用卡消费的快速增长。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量高于去年同期。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还通过降息、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运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据测算,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辖内金融机构增加可用资金约250亿元。

同时,企业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一季度,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利率为6.69%,环比和同比分别降低0.17和0.26个百分点。2月28日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后,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51%,环比回落0.33个百分点,表明货币政策在辖区得到有效传导。此外,人民银行宁波市市中心支行还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对金融机构的涉农及小微信贷投放提供资金支持,并引导其降低贷款和贴现利率,有效地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我们将积极作为,保持货币信贷和融资总量适度增长,继续推进新型融资工具的推广应用,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合理的资金需求。”人民银行宁波市市中心支行行长宋汉光表示。

员工拒去新厂辞职追讨补偿有理

客观情况变化不能成为企业违约理由

■记者/董小军

春节过后,北仑一家公司在相对偏远的春晓镇新开了一家分厂,需要调派一部分职工去那里工作,以尽快使新厂各方面的工作都正常运转起来,原在厂办工作的刘某等12人被选中。近日,公司正式向他们发出了《上岗地点变动通知》。公司称,去新厂工作一切待遇不变,另外再支付每月200元的交通费用。

由于刘某家在北仑城区,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因此不愿去新厂上班。公司向刘某表示,如果拒绝去新厂,就很难在公司总部安排新的工作岗位。无奈之下,刘某只得递交了辞呈,同时,她还向公司提出要求:按照其工作年限,向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但公司认为,刘某是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公司毋需支付这笔费用。双方僵持不下,最终

引发劳动争议。

张律师多年代理劳动诉讼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劳动争议不断出现,这其中,有不少是企业的外部情况发生变化,企业没有作出相应的变化,或者对因此可能引发的纠纷认识不足引发的,北仑这家公司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争议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企业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张律师分析称,这起争议是因企业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引发的,也许在企业看来,派刘某等公司骨干去新厂,并非是要故意为难他们,相反,是对刘某等人能力的一种肯定,因此有点“理直气壮”。

问题在于,在公司与刘某等职工原先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曾有关于劳动者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的明确规定,现在,企业新开了工厂,派刘某等去那里上班,实际上是变更了工作

内容和工作地点,这虽然是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的,但却与劳动合同条款的约定不相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就是说,即使因为客观原因必须改变职工的工作地点和岗位,也必须是职工自愿,否则,职工有权拒绝。而刘某所在的单位,没有与刘某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单方面下达《上岗地点变动通知》,使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变更,实际上是不愿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而且涉嫌侵害刘某的知情权、协商权。如果企业因此不让职工上岗,更是一种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刘某就有权单方解

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刘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并因此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那么,关于经济补偿,相关法律有何规定呢?张律师介绍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刘某这样因企业情况发生变化,而主动要求离职者,与被企业违法“辞退”的职工所能获得的补偿是一样的,即公司必须按照其工作年限,以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按半个月计算),向刘某支付经济补偿。

4月12日,刘某向本报打来电话称,她与原企业之间的争议,在相关劳动部门的调解下已经解决,企业同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予以经济补偿。

法律与生活

Fa Lü Yu Sheng Huo

余姚公布十大案例 增强法治宣传效果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精选了十个案例向社会公布,以进一步推动司法宣传和普法教育工作。

据了解,这十个案例是从该院2014年审结的近1.5万个案件中筛选出来的,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各种类型,从案情回顾、法院判决、裁判要旨三个角度作了详细的剖析。案件内容包括,规范污水处理企业运营秩序,明确排污责任,支持行政机关依法监管环境污染;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对“职场碰瓷者”任意索要工资、补偿行为予以惩处;通过网络强制执行道义义务,以实现当事人名誉等。而更多的是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宣传有关民间借贷、买卖合同、损害赔偿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卢文静)

■法眼观潮

郭敬波

近日,有债主到市区某小学门口发传单,并威胁可能对学生造成误伤,这让家长们十分揪心。事件缘于小学两位老师的母亲及丈母娘以高息借了一大笔钱,现在钱还不出来了(4月10日《钱江晚报》)。

在中国,单位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词汇。单位有独特的功能,它俨然成了连接政府与社会的中间组织,在“单位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它承载了不应承载的内容,夫妻之间产生矛盾要到“单位”闹,民房拆迁到“单位”施压,甚至如报道中借钱不

还,也会闹到“单位”。

“单位”这种职能错位,源于“单位”曾经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和占有者,在公众眼中俨然成了“政府的代表”,是所属人员的直接管理者和依赖对象,这让“有事找单位”成了一种常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个体正从“单位人”回归“社会人”的角色。

如果报道中的借款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债权人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涉及非法吸收,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可能比公安、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更管用。当事人为何还是绕道而行,选择到“单位”

闹?就是因为这些年“闹”比“法”管用,“单位”之中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在当事人的“熟人圈”里制造点事端,给当事人一些压力,也给政府一些压力,好让自己的事情尽快得以解决。

我们不否认当事人追回欠款是一种正当和合法的权益,但到单位追讨,首先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你闹的人不是吸存者,“单位”也不是吸存者的“单位”;其次,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轻则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重则构成犯罪,是要依法追责的;再者国家三令五申“高息不受法律保护”,为何还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神话。

私事不能闹“单位”,别由“受害者”变成“违法者”。

担保签名不规范 连带责任难认定

■案情

余姚市的唐某与王某是朋友,2013年王某多次以资金困难为由向唐某借款,唐某为此陆续借给对方13.6万元,另一个朋友章某为这笔借款做了担保。

一年过去了,王某却始终未归还借款,唐某向王某讨要,但借钱容易讨钱难,王某始终以经济困难为由拖延。无奈之下,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归还借款,同时要求章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庭审时,唐某向法庭出具了厚厚一叠总共12张格式借条,用以证明2013年6月至9月期间,王某曾向唐某借款的事实。然而法官发现在这12张借条中,其中有一张借条上章某的名字并未书写在担保人的签名栏上,而是写在借条的空白处。

法院最终判决,王某归还唐某借款13.6万元,章某只需承担9.1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

■说法

民间借贷很多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双方基于信赖关系而借款,在书写借条上往往不过分追究借条的内容、格式,书写相对简单,如只写借款本金、口头约定利息,这样很可能留下隐患,造成一方当事人维权的困难。

一、口头约定,无书面凭证。碍于情面双方仅以口头约定,没有书写任何凭证。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借款催讨无据的情况下,出借人仅能以言语抗辩,很难有实质证据证明借款事实。亲兄弟明算账,任何借贷都应出具书面凭证,这样在借款难以收回时出借人才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借条内容模糊,约定不明确。

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庭主要是依据双方出具的借条来认定借贷关系,借条中出现的每一个字都会影响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在书写借条时,一方面要尽量简洁明了,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用词,另一方面,借条内容应当完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等法律规定,一张不存在瑕疵的借条应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内容;当然,附带借款人的身份证号码更好。

三、借据书写不规范,借条难认定。

例如本案中,由于担保人未在指定位置书写姓名,导致出借人要求担保人章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难以获得支持。一些案件中甚至出现别有用心的人假借他人之手在借条上签名,在法庭上以字迹非本人所签否认借款事实。在书写借条时,双方当事人一定要当面书写,字迹清晰,并且确保签在指定栏目下。

(卢文静)

私事闹到“单位”是何心理?

■法眼观潮

郭敬波

还,也会闹到“单位”。

“单位”这种职能错位,源于“单位”曾经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和占有者,在公众眼中俨然成了“政府的代表”,是所属人员的直接管理者和依赖对象,这让“有事找单位”成了一种常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个体正从“单位人”回归“社会人”的角色。

如果报道中的借款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债权人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涉及非法吸收,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可能比公安、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更管用。当事人为何还是绕道而行,选择到“单位”

闹?就是因为这些年“闹”比“法”管用,“单位”之中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在当事人的“熟人圈”里制造点事端,给当事人一些压力,也给政府一些压力,好让自己的事情尽快得以解决。

我们不否认当事人追回欠款是一种正当和合法的权益,但到单位追讨,首先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你闹的人不是吸存者,“单位”也不是吸存者的“单位”;其次,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轻则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重则构成犯罪,是要依法追责的;再者国家三令五申“高息不受法律保护”,为何还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神话。

私事不能闹“单位”,别由“受害者”变成“违法者”。

前妻改掉孩子名 男子拒付抚养费

■案情

张某与李某均是宁海人,2011年张某和李某两人离婚,并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闹上了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孩子由女方李某抚养,张某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1000余元。

离婚一年后,张某重新组成家庭,2012年后不再支付抚养费用。李某向宁海法院起诉,要求支付两年多的抚养费3万多元。判决生效后,张某仍然未支付。

执行法官把张某叫到了法院,面对询问,张某一会儿说自己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付不起抚养费;一会儿又说离婚前孩子的学费都是自己承担的,李某都没管过,现在应该由李某出。法官耐心向他解释了相关法

律规定,并要求其及时履行。张某最后称,之所以拒绝支付抚养费,原因在于李某把孩子的名字完全改掉了,张某认为,孩子已经与自己无关。

■说法

不管孩子改不改名字,抚养子女是作为父亲的应尽义务,拒不履行法律义务,极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本案中的张某在经过法官的说法教育后,已经支付了抚养费。

但另一方面,夫妻离婚后,获得孩子抚养权的一方,无权单方面擅自更改孩子姓名,如果已经更改,没有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可以要求重新恢复,直至向法院起诉。(余亚亚)